

集外小说《角喜发传》

胡也频的中、短篇小说生前多有结集出版,如《圣徒》《活珠子》《往何处去》《诗稿》《消磨》《牧场上》《三个不统一的人物》《四星期》等。

根据现有文献,胡也频发表作品时的署名已知的达十余个,包括胡也频、也频、频、胡崇轩、崇轩、沉默、胡一平、茵、野草、白丁、乃之、宛约、黄英等。

《家长》(小说,作于北京,载1927年9月26日、27日《晨报副刊》;

《资本家》(独幕剧,载1927年12月13日、14日、15日、16日、17日、19日《晨报副刊》;

《雪白的鸢鹑》(小说,1928年作,载1928年7月31日《中央日报》副刊《红与黑》第三号。

不难看出,“宛约”是1927年至1928年间胡也频多次使用的笔名之一。有意思的是,胡也频在1928年的小说《一群朋友》中还设计了一个名叫宛约君的人物。

这部短篇小说虚构了一个名为梨村的乡土世界,叙述了“梨村花子群中一个进步的花子”——主人公喜发的“小传”。



《角喜发传》

明,六岁时流浪到梨村,由村中一个老乞丐抚养长大。不过梨村人对花子格外优待,这里的花子也较别处更多。

胡也频史料二题

□金传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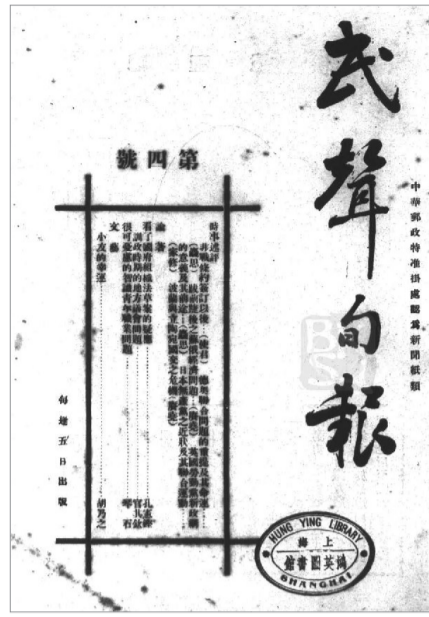
部分作品初刊处与新见笔名

《胡也频著作系年目录》(以下简称《目录》)是目前收录胡也频著作最为完整的研究资料,除遗漏《角喜发传》外,还对一些作品的初刊信息著录不详。

1926年10月29日北京《世界日报》副刊《文学》周刊第2号发表胡也频的诗歌《洞庭湖上》(1929年收入红黑出版社出版的《也频诗选》)。

《洞庭湖上》《悲愤》《站在岩石上的女郎》外,本文尚无法提供《世界日报·文学》周刊上胡也频作品的详细篇目,只能留待他日再作补充。

1926年11月,《世界日报》周刊之二《蔷薇》创刊,由蔷薇社编辑,实际负责人为女作家石评梅与陆晶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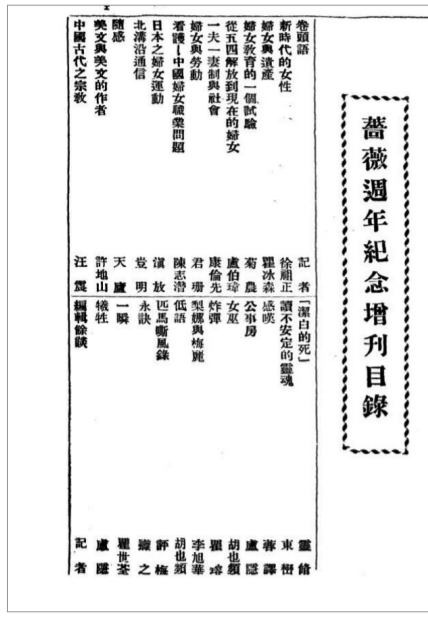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小友的幸福》刊于《民声旬报》

初刊《世界日报·文学》1927年5月27日第8期(参见王锦厚、伍加伦、钟德慧《胡也频曾在《世界日报》发表诗作》,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》第6辑)。

由于未能查到原刊,除《洞庭湖上》《悲愤》《站在岩石上的女郎》外,本文尚无法提供《世界日报·文学》周刊上胡也频作品的详细篇目。

1926年11月,《世界日报》周刊之二《蔷薇》创刊,由蔷薇社编辑,实际负责人为女作家石评梅与陆晶清。



蔷薇周年纪念增刊

仁继续考证:

小说《小草》,1927年7月19日登于第34期,署“茵”;

散文《悲观主义及其他》,载1928年7月31日第71期,署“白丁”;

小说《夜行》,载1929年10月29日第133期,署“白丁”。

此外,1925年12月27日《京报》副刊《民众》第43号刊有署“野草”的散文《猫的来历——民间传说之一》。

1928年9月,施蛰存、戴望舒、刘呐鸥创办的上海第一线书店出版了胡也频的短篇小说集《往何处去》,收录了《往何处去》《黑点》《一群朋友》《约会》《坟》《毁灭》《海岸边》《生命》《雪白的鸢鹑》等九篇小说。

论李伟森小说

□朱元军

左联五烈士之死,距今已有80多年了。我因鲁迅而知晓了柔石,因丁玲而了解到胡也频,曾感叹殷夫作品的才情与意切以及冯铿文字中的战斗激情,对这些作家创作都深有感触。

《除夕》是李伟森以南平的笔名发表于1923年12月1日的《妇女杂志》第9卷第12号。小说中“她”,以他者的身份讲述着一个年轻妇女的悲剧,没有史诗风格,也没有传奇色彩,是一个极其普通而又具有代表性的故事。

李伟森的这两篇小说,不仅刻画了旧中国妇女的生存困境,也是自我人生经历的写实。他还有意识地探索了以妇女为典型代表的劳苦大众的解放之路。

社会问题的一个切片——底层妇女生存困境的写实

“问题小说”是五四运动之后,文学领域渐出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创作新方向。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,开始倡导文学要“表现并讨论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”,掀起了“问题小说”的热潮。

代”;二是欧洲表现社会人生作品的影响。从互助社、共存社的尝试,李伟森和一群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地探索与“思考”社会诸问题的解决之道,妇女问题也是他重点关注的。

封建大家庭的女性,活着的一生也是挣扎的一生,为获得自己生存空间,面临着各种斗争。在压抑和抗争中,有的人性变得扭曲,释放出恶的一面,“后母”往往是其中最熟知的代名词。

“底层妇女问题”是李伟森小说的一个切入面,在自叙传的色彩渲染下,有着深入现场的真实与朴素,展示了一幅旧社会妇女生存环境的切片,有着独特的深刻性,也渗透出作者自我的“思考”。

妇女解放的“思考”——一条自立的道路

关于妇女解放的问题,李伟森在《姊姊的屈服》的“芸芳附记”中,谈到“妇女解放”的“声浪很高调”,多为不明实际的纸上谈兵,效果不好,并提出“负有运动责任的人应该深思惭愧的地方”。

(一)旧社会妇女的觉醒 识字读书使妇女审视自己 and 这个世界的关系成为可能,也在潜移默化中引领她们在思想上改变。

在《除夕》中,“她”的手里拿着书是《镜花缘》,这是一本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。胡适曾经考证此书并发表了《中国最早的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——〈镜花缘〉》一文。

平等的待遇,平等的教育,平等的选举制度。”书中有关女儿国的描述,“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;他对于女子贞操,女子教育,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,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……”

在《姊姊的屈服》中两处写到了桂姊看的书:可怜,桂姊只我们在私塾的时候读了半年书,你或者还记得那时的情景。这几年来,她简直没有拿书本;偶尔看看的,也不过是《秦雪梅吊孝》,《孟姜女寻夫》……几种唱本罢了。

关于《秦雪梅吊孝》和《孟姜女寻夫》的唱本。前者主要是反对封建礼教及门第观念,颂扬男女真挚情感的。后者是女性不畏权贵,冲破阻挠,勇敢追求幸福的,也传达出对女性坚毅、执著品格的赞美。

我没有想得我今生还能拿笔写信的。我现在能够拿笔写信,妹妹,你高兴不高兴呵! 妹妹,我现在也不象以前那样作(着)急了。我现在每天除了弄饭洗衣服以外,就做鞋子,看你给我的信书和杂志,写一张大字,一百个小字。我着(觉)得很快乐。

(二)自立是妇女解放的一条出路 小说《姊姊的屈服》先于《除夕》发表,但妇女的反抗和关

于旧社会妇女问题的见解在前者体现的更为充分。尽管,桂英在最后回归了,成为一个“克尽妇道的媳妇”和“养育提携的母亲”,成为一个屈服于封建势力的妇女典型,但其个体的自立意识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。

首先从妇女的个性解放。一个旧社会的弱女子在追求个性解放的过程中,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。桂英以捍卫自我的独立个性,尽管有些任性,但也有着积极的一面。

自从我们那位胡嫂来我家以后,桂姊与她不和,常有吵闹的事。我母因嫂老实,便总是压住桂姊。桂姊的性情,你是知道的,能够容忍下去么?有一次本来胡嫂理屈,我母故抑桂姊;晚间桂姊悄悄地向哥哥买了一包红砚,谋自尽,被刘妈察觉了……

胡嫂是母亲喜欢的老实人,是一个没有个性的顺民,是被抽走思想的好奴仆,是封建男权社会中底层妇女的典型代表。胡嫂的老实人做派与开始关注自我,想要张扬个性的桂英是对立的。桂英与胡嫂的不和,实际上是桂英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抗,反抗是激烈的,但终因“不安于家”而被匆匆地嫁出去,也为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。

其次从妇女自立思想。“我”作为一个旁观者和点评人,是作者在小说中的代言人,是桂英思想上的指引者。尽管桂英屈服了,但一定会有更多的妇女受到启迪而走向自立,走向解放。

我说:“我们女子所以受男子压迫,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能谋生活;倘使我们自己有一种手艺,能够自己赚钱养活自己,那我们就便可以不受男子的压迫,可以自由行动,要怎样就怎样了!”

桂英很相信“我”说的话,还建言祖母为家“早点打算”。后来,她不顾祖母的禁止,暗地里学习缝鞋子的手艺,想依靠自己的能力谋生活“以免将来挨饿”。她还强调“我现在只管我自己,好到了要娶的时候,不至于饿死”。这些都反映了桂英独立自主的生活愿望和自立意识的增强。

桂英还控诉了封建包办婚姻所带来的不幸,认为“倘使这样叫做夫妻,我便奉劝世界上的人都不要嫁人了!”。“我”则充分发表了对于这种婚姻的看法:

我只说:“到了这种地步,当然只有顾自己的了。依着旧道理想,丈夫应该养活妻子的;若是丈夫不能养活妻子,则妻子自己顾自己,不去麻烦男子,便是极合理的了,未必还要妻子养活丈夫么?……

桂英在表达对婚姻不满的同时,闪烁出自主选择婚姻生活的思想火花,“我”所谈到的女性自立的话语,也许成为了她后来“私奔”的潜在动因。尽管“私奔”事件是盲目的、被设计的,是桂英的一个糟糕而失败的尝试,但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她自己决定自己未来的主观意志。

总的来说,李伟森的小说以其亲身经历为蓝本,深刻地呈现了旧社会妇女所面临的多重生存困境。《除夕》通过倒叙的方式,展示了一个生活在敬节堂的妇女在“人间地狱”中悲惨的生活图景,深刻揭露了旧社会礼教“吃人”的本质。

(作者单位: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)